

东吴名家·王尧

在河流的两岸或在河流之中

——关于研究与创作的几个问题^①

王 尧

我们可以说,人一生是一条河,也可以说这世界是一条河,那么人便是河两岸的风景,或在河流中飘的。风景可能是一棵树,也可能是一株草,也可能是河流里的万物。这些都是整个生命结构中的一个部分。在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之下,我主要想探讨创作与研究的关系。如果把文学比作一条河,河流有两岸,一岸就是文学研究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。当然,文学研究本身也是跨学科的,研究方法必然会形成学科交叉,比如和历史学、哲学相交融,所以中国传统里一直有“文史哲不分家”的说法。

而河流的另外一岸就是文学创作。创作这一领域要相对复杂一些。自“五四”以来,我们习惯把文体划分为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,如今文体范围进一步拓展,网络文学、影视文学等,都成为当下主流的文艺类型。长期以来,我们几乎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割裂开来,但仔细思索会发现,这样的划分并非完全合理。

在中国文化传统中,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——文章。传统语境里的“文章”,不仅包含诗词曲赋,也将小说囊括其中。古人不会刻意区分“作家”“诗人”,只会统称一个人为“写文章的人”。“写文章的人”这个说法,其实特别有意

思。现在口语里的相关表述变得随意,有人问“你做什么工作”,回答“搞文学”,听起来比较粗浅。但回归本源,“写文章”这个概念内涵广博、体量宏大。

“文章”的范畴远不止文学创作,学术文章也包含在内。如今我们沿用西方建立的学术文体规范撰写学术文章,讲究引述文献,梳理观点,展开分析论证。这套范式是西式的治学与著述方式,但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里,学术思想的表达有着丰富多样的文体。翻阅传统典籍就能发现,诗话、词话、小说评点、各类随笔杂记,都是古人表达学术观点、思想见解的载体,形式十分灵活。这种学术表达的多样性,在各类著述、杂记当中随处可见。

到了鲁迅那一代文人身上,这种传统依然得到充分延续。比如大家都熟知的《〈呐喊〉自序》,你说它是散文,不完全是;说它是随笔,也不尽然。以如今的文体标准来看,它很难被简单归类,但这篇序言,却是解读鲁迅文学思想,以及他与五四运动关系的重要文献之一。

很多人都提到《论语》在职称评估体系中

^① 本文根据作者2026年5月27日在“东吴讲堂”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。作者已修订。

的尴尬。《论语》是孔子弟子整理的语录体文本,放在今天,如果有人拿着语录体文字当作学术成果,在高校职称评审的材料初审环节,大概率是无法通过的。由此就能看出古今文体评判标准的巨大差异。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:传统文人,乃至近现代文人,大多是文体上的多面手。举例而言,苏东坡诗、词、文、书法、绘画无一不精,同时也是政治家。如果按照今天的职业划分,要把他拆分成诗人、词人、散文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政治家,这种拆分本身就不合理。传统意义上的文人、文学家,本就是打通各类文体的。新文化运动之后,这一传统也一直在传承发扬。

身处新旧学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,几乎都是跨文体、跨文类的大家。再看鲁迅,不只是伟大的小说家,也做学术研究,写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他写的《朝花夕拾》等散文、大量杂文影响深远,同时他还是翻译家,涉猎极广。还有朱自清先生,他深耕古典文学研究,研究宋代文学,学术功底深厚,同时散文创作成就卓著,也创作过新诗。他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,毕业后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。据说他早年开设的一些课程,比如《宋诗选》,选课学生寥寥无几,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位学生,他自己也曾为此失去信心。就是这样一位学者,散文作品却流传百年,影响深远。

进入现代社会,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,尤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,学科划分越来越严苛。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,在培养方向、招生渠道上彻底分开,考核体系也完全不同。文学学科内部又细分出古代文学、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汉语言文字学等诸多二级学科。精细化分工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,但也带来一个突出问题:割裂了创作与研究之间天然的联系。

回到我今天的主题:文学创作与研究,是站在河流的两岸,还是交融在河流之中?回望历史,再审视当下,河流两岸的风景,终究会倒映在河水之中,两岸风景本就是河流景观的一部分。倘若河流消失,两岸的风景也会彻底失去原有的意义,发生本质的变化。我近期走访过不少历史遗址,大部分遗址都被完整保护下来,没有被拆除。观察这些遗址就能发现一个特点:周边

的风景不断变迁,不变的是遗址的主体部分。参照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。借用这个比喻来说,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,就如同河流两岸的风景与水中倒影,二者本是一体两面。

简要而言,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,分别强调两种不同的核心能力。人为划分二者的界限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第一种能力,是论述能力。我们依靠理论、方法,解读文学作品、文艺思潮、文学现象,开展文学史专题研究;可以将文学作品、文学史作为文化分析的材料,完成历史化、经典化的梳理。文学批评也可以介入当下社会,搭建作品、读者、思想与审美之间的桥梁。文学研究本身,是依托文学创作而生的一套独立话语体系。

从事研究的人大致分为两类:一类是纯粹的学者,依靠阅读积累与理论建构,形成专属的研究框架、理论与治学方法;另一类是作家型研究者,结合自身创作体验,同时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,发表观点。我曾读过《巴黎评论》,书中收录了世界顶尖作家、诗人的访谈对话。这些创作者的观点、思考,与纯粹依靠文献、理论做批评研究的学者截然不同。在和国内诸多作家交流的过程中,我对此深有体会。《巴黎评论》里一流作家的访谈,视角独特、见解鲜活。而在国内,还有一种常见文体——作家创作谈,近些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创作谈作品。在我看来,不少作家的创作谈,水准甚至超越了其文学创作本身。学术研究讲究体系严谨、论证周密,而作家创作谈多结合个人生命体验,表达随性、视野开阔、思想自由,不需要周密的逻辑论证。但二者也存在核心交汇点:无论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者,还是兼具创作体验的学者、作家,都必须立足文本、文学现象、文艺思潮,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思考与表达。如果能同时兼具理论素养与创作体悟,我们就能更贴近文本分析,更深入地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心路。

前面我们重点谈到了论述能力,而在论述能力之外,文学传承、文学表达中还有一种长期被忽视的能力——叙述能力。叙述能力,长期以来在大学文学教育中被弱化。如今高校中文系大多只教授论文写作,很多院校撤销了写作教研室,即便保留,授课教师也未必有一线创作经

历。我并非否定这类教师的教学能力,只是想指出:对叙述能力的漠视,是当下大学文学教育存在的一大问题。

长久以来,我们的文学教育,只是把文学当作一套知识体系来传承。批评家、研究者自身不再进行文学想象,只需要解读他人的想象,这就限制了其文字的辽阔和边界。现在很多人不具备良好的叙述能力,讲述一件事情条理混乱。叙述,不只是简单地讲故事,本质是构建世界、展开想象的能力。叙述不是静止的,而是动态的。叙述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,除了故事逻辑之外,核心就在于创作者想象力的边界。多年来的制式教育,用条条框框限制了人的想象力。所以我希望,当下的文学教育,在培养论述能力的同时,也要重视叙述能力。如果一个人既能论述,又能叙述,也即既能用学养做梳理、论证、分析,又能用文字展开想象与表达,我们就能真正打通创作与研究的壁垒,让河流两岸的风景倒映在流水之中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。

当然,每个人的天赋、气质各有不同:有人擅长论述、说理,有人擅长想象、叙事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论述能力与叙述能力不是并存、平衡的,后天长期的训练,让其中一种能力被不断强化,另一种被抑制。作为教师,要尽可能地发掘学生身上的这两种能力。极少数人能够将两种能力都发挥到极致,大部分人往往以一种为主,兼顾另一种。像鲁迅、郭沫若、钱钟书、茅盾等人,便是兼具顶尖论述与叙述能力的大家,属于天才式的人物。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。

谈及“天才”,我向来比较谨慎。我们这一代人,客观来说,“先天不足,后天失调”。我中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条件并不理想,课本之外的阅读资源极度匮乏。少年时代,我偶然从同乡青年那里读到《林海雪原》《红旗谱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红色经典小说。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的表姐正是电影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中金环、银环的扮演者王晓棠,这也让我对这部作品多了一份亲近感。那个年代,课外读物少之又少。高中时期,曾有同学传阅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,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,判断这类读物内容低俗,便直接拒绝阅读。在那样一个物质、精神资源都相对贫瘠的年代,我们的视野受到

很大的限制。进入大学之后,人生才迎来巨大的转变。一个人潜藏的能力,往往是在持续的阅读、写作当中被逐步唤醒的。在不断实践中,原本沉睡的潜能、天赋被激活,我们才会发现自身的长处。

回到今天的主题,结合我个人的研究与创作经历,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感悟。我们这一代人,大多怀揣理想主义,时至今日,我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人生历经诸多挫折,但理想主义的光芒从未褪去。理想主义者往往内心敏感,也容易陷入忧郁。我外表乐观平和,很多朋友并不知晓,我的内心其实十分脆弱、细腻。多年的思想教育让我外在变得坚韧,但人到一定年纪,很多心绪、困惑只能自我消解,依靠独处、品茶慢慢抚平。

大学毕业后,我主攻学术研究。最初我研究现代汉语方向,语法、修辞功底扎实。普通话测试中原本并不被老师看好,但我凭借朗读刘白羽《长江三日》,顺利通过首批测试,准确率达标,也给身边同学带来了很大的鼓舞。受理想主义影响,我希望用文字观照现实、思考社会,于是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,主攻散文、小说、文学史与思想史。

我的研究有一条核心主线: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史的关系,个体与历史的关系。结合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角色,我重点探讨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关系。每个人都拥有双重生活:一是日常世俗生活,二是精神思想生活。思想生活的来源非常丰富。我出生于五月九日,经常自称是“五月的孩子”;成长于物资匮乏的年代,又亲历特殊历史时期,“红色的五月”,这些经历塑造了我的认知与思想根基;受时代熏陶,一直自认是“五四精神的追随者”。这三个“五月”叠加在一起,表明我自己的思想来源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。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个人体验,我常常换位思考:如果身处历史中的某个阶段、某个处境,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?

基于这样的思考,我开始尝试文学创作,连续三年在杂志上开设专栏。第一个专栏在《收获》上,名为《沧海文心》,聚焦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。南京沦陷后,国民政府迁都重庆,大批文

化名流汇聚于此,郭沫若、老舍、巴金、曹禺等文人都曾在重庆生活。当时的重庆,既有国民政府机构,也有中共办事处,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红岩等。抗战阶段,国民政府拥有财政资源,会为文化人提供津贴补助;而共产党人物资匮乏,用小米、红枣、土布等朴素物资关怀文人。在时局动荡之时,知识分子立场各异,但所有人都秉持同一个信念:抗日救国。大家都坚信:文化不灭,民族就不会消亡。

完成《沧海文心》之后,我又在《钟山》开设第二个专栏《日常的弦歌》,写西南联合大学。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段传奇,梅贻琦校长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,以及影视作品《无问西东》,都让这段历史被大众熟知。但翻阅大量史料后,我发现西南联大的生活艰苦超乎想象。我希望褪去光环,回归日常生活,去探寻联大的精神风骨,是如何在艰苦岁月里生根、延续的。

抗战年代战火纷飞,日军空袭不断,联大师生的生活更是极度清贫。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为补贴家用,制作江南传统糕点定胜糕,到昆明街头售卖。朱自清、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中家庭负担最重的两位学者,常年需要申请额外补助。朱自清长期与家人分居,家中老幼都需要他接济。为维持生计,他甚至变卖家中的折叠床,身形矮小的他,两次才将床扛到典当行。联大宿舍条件也十分简陋,窗户用纸糊,教室和宿舍都是土墙,屋顶最初为铁皮材质,后来因经费紧张,换成了茅草顶。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,还保留着西南联大一幢茅草顶教室。学生宿舍拥挤狭小,十几人同住一室,条件艰苦。当然,联大的学生也和普通人一样,有贪玩、旷课、交友的日常,但求学向上始终是主流。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缺,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敏感、纠结与喜怒哀乐。

深挖这些日常细节之后,我常常反问自己:如果我身处西南联大,亲历那样的艰难岁月,我能否坚守初心、扛住磨难?这段专栏写作的经历,彻底改变了我的创作思路,也为后续的小说创作打下基础。我创作了中篇小说《民谣》,小说开篇写道:“我坐在码头上,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。”^①我生长于水乡,门前便是河道,码头是少年时代最熟悉的场景,太阳把码头晒得发热的时候,坐在上面,热烘烘的,就会

觉得太阳成了一张纸。这部小说的创作断断续续搁置了很久,原先构思的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。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,生活节奏放缓,我静下心来,用数月时间完成了《民谣》。这部作品虽为虚构,但人物、情节都基于个人生活体验,是有原型的,想象是有所依傍的。而完成这部小说后,我开始构思新的创作方向:跳出纯粹的个人生活叙事,回归我的研究领域和思想生活当中,聚焦知识分子群体,创作一部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。

如果说《民谣》写的是我的前半生,那么《桃花坞》就要写我的前世。我在苏州生活了四十余年,对大街小巷都很熟悉,人与城市早已融为一体,密不可分,觉得自己已成为街巷的一砖一瓦,而街巷也仿佛是自己身体中的血管。我并非土生土长的苏州人,二十一岁那年,提着木箱来到苏州。据我父亲讲,我的祖先籍贯便是苏州,从阊门那一带外迁,祖上堂号为“三槐堂”,八九百年前族人迁徙离开苏州。

多年来,我时常在苏州街巷漫步,也曾寻访先祖迁徙的足迹。我很早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苏州桃花坞大街,名传天下,街上却见不到一株桃树。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留存了数十年。桃花坞本身是极具分量的文化符号,“桃花”在中国文化中,象征着理想、桃源与美好,本身就带有乌托邦的意象。而抗战时期苏州沦陷,昔日如同世外桃源的桃花坞,瞬间沦为乱世。这种巨大的反差,让我决定以桃花坞为核心空间,书写苏州文人家庭在大时代下的命运浮沉。

我常在不同时节去往桃花坞,晴天、雨天、风雪之中,街巷的风貌各有不同,也不断给我创作灵感。结合史料与实地走访,我逐步构思人物形象,故事以苏州几个文人家族为主体,塑造了方后乐、黄青梅、周惠之等核心人物。我无数次到档案馆,查阅了大量地方档案、民国回忆录、地方史料。民国苏州的民俗、职业、生活形态都需要精准还原,比如当年的苏州菜谱、童养媳的生存状态,都要核实,这种历史细节是不能虚构的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航运路线、轮船公司、航行站点,都要仔细考订;江南民众的服饰

① 王尧:《民谣》,第1页,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21。

面料、款式,学生着装,烟酒品牌,也咨询过纺织、民俗专业的老师,参考了大量文献。

在扎实考据的基础上,更多的是人物的构思,我确立了小说四大核心内容:第一,家国情怀,聚焦抗战时期的民族大义;第二,书生意气,书写传统知识分子群体;第三,儿女情长,没有儿女情长不成为小说;第四,江南日常生活。这是整部小说的基础。我将叙事重心放在沦陷以后,文人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如何坚守民族气节,以一种韧性的力量从艰难的生活里挺过去。

小说最初设定的时间跨度为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夕,在创作过程中,叙事脉络不断向前延伸,追溯至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时期。故事以苏州方家三代人为核心主线,串联起周家、黄家等多个文人家族。为铺展宏大的历史人文脉络,故事开篇从杭州写起。杭州是朱自清从北大毕业后工作的第一站,而小说中的方家与朱自清颇有渊源。朱自清早年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,后来又去了西南联大,这段经历也被融入小说中。杭州一师汇聚了诸多名家,校长经亨颐、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陈望道、教育家夏丏尊等人都曾在此任教。顺着这条线索追溯,故事又关联到鲁迅、秋瑾、章太炎等浙江文人,人物关系、时代脉络不断拓展。方家长子投身革命,后来下落不明;次子方梅初遵从父命,前往苏州的省立图书馆任职,就此与居住桃花坞大街附近的周家产生交集;周惠之毕业于景海女子师范学校。人物关系、地域空间就此搭建完成。整部小说的叙事空间横跨杭州、苏州、昆明、北平、哈尔滨等多地,时间线贯穿数十年历史。

我在创作中重点思考两大命题:其一,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依靠什么坚守本心,保持民族气节;其二,聚焦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,小说中涉及很多现代思想史的问题,比如新与旧的关系问题、传统文化的问题、中西的问题等。我将这些问题化为具体的细节和内容,穿插于整部小说中。我始终认为,长篇小说不只是讲故事,它还应该有一个人文谱系,能够反映大时代里的思想冲突,而不仅仅是反抗、坚守、牺牲。人物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关系,因此这部作品也具备思想史的解读价值。我

力求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。当下不少小说偏重情节叙事,缺少人文的谱系与思想的内涵,而这也是我想要补足的地方。

同时,我也着力刻画近代文人的命运悲剧。在传统写法中,人物悲剧多为战死、投湖自杀等,而我做出了不一样的设计:让几个核心的女性人物失踪。周惠之的苏云阿姨,擅长昆曲,不肯为日本人演出,最终带着弟子避居湖州乡下,从此不知所终,这是一位美好人物形象的悄然消逝。另一个核心人物周惠之,在战乱与苦难的打击下精神失常、失去记忆,最终离家出走,下落不明。在小说后半部分,亲人对她的寻找贯穿始终,人物身影反复出现。还有一位女性角色黄青梅,原本计划与方后乐一同前往北平求学,她希望自己成为林徽因一样的人物,后来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。内战爆发后,大洋两岸阻隔,书信断绝,方后乐和黄青梅失联,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人的共同命运。很多同行和读者问我,小说中哪个人物塑造得最好。我坦言,是周惠之这个人物。

最初构思时,我也曾想让这个人物走向死亡,但后来改变了想法。将美好的人物直接毁灭,比较容易写,毁灭了以后哀悼她,但故事也就此终结。而让人物失踪、生死未卜,便会生出长久的等待、寻找,这种长久的寻找所产生的悲剧力量和冲击力量是更大的。也正因如此,完成《桃花坞》之后,我很少重读这部作品,将亲手塑造出的周惠之写成了下落不明的失踪结局,让整部小说笼罩着苍凉的底色,令我内心倍感煎熬。这对我而言,也算是创作中一件“残忍”的事。

不少读者评价,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刻画尤为细腻,不似男性作者的笔触。写小说,最重要的就是共情能力,要沉浸式地代入人物的身份、处境与心境。我对女性内心世界的体察,源于生活中的观察与感悟,也希望写出人性本真的美好。人物的成长、选择,不是线性的,而是有一个过程,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,要符合那一代人的性格和身份。方后乐受左翼影响,成为左翼青年,但他参加革命也有偶然性。他受身边亲友、时代事件的多重影响,一次意外事件,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。小说采用多主角、复调式

的叙事结构,方家、周家等多条线索并行。

我特别关注小说的语言问题。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呼吸,作家的气质决定其语言的面貌。不同文体、不同内容,应当搭配不同的叙述语言和对话。《民谣》写乡土岁月,语言偏向明净、斑斓;而《桃花坞》书写江南文人、民国旧事,采用了典雅的汉语,文风古雅,贴合那个时代的气质与文人身份。小说还融入苏州本土的吴语对话,我特意请教了评弹演员,将部分对话替换成吴语,叙述语言、人物对话整体上追求典雅的风格。

《桃花坞》出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,也因时代主题而受到关注,登上了各种榜单。一部作品能否不死,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汰洗。小说中有一处关键的语句:方黎子和方梅初最初到桃花坞大街看风景,准备买房子时,方梅初问其父方黎子,桃花坞大街为什么没有桃花?方黎子回答称,桃花坞妙就妙在没有桃花,你想象哪里有桃花,哪里就桃花灼灼。多少年以后,方梅初也用这句话告诉他的儿子方后乐说,你想象哪里有桃花,哪里就桃花灼灼。这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方法,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老师、同学,特别是青年朋友的一句话。

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‘文章’传统与百年中国散文发展研究”(24&ZD236)阶段性成果。】

【作者简介】王尧,著名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,国家重大人才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,苏州大学讲席教授、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、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,苏州市文联主席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,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代文学海外译介与研究。出版学术著作《中国当代散文史》《批评的操练》《“思想事件”的修辞》《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》《“新时期文学”口述史》等,长篇小说《民谣》《桃花坞》,散文集《把吴钩看了》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《纸上的知识分子》《时代与肖像》《日常的弦歌:西南联大的回响》等;主编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》《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、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、施耐庵文学奖、教育部优秀成果奖二等奖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。